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常凯 主编



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的 经济学

(美) 约翰·R·康芒斯 (John Rogers Commons) 著



朱飞 田松青 盛龙飞 常程 孟泉 译 朱飞 校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常凯 主 编



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的 经 济 学

(美) 约翰·R·康芒斯 (John Rogers Commons) 著



朱飞 田松青 盛龙飞 常程 孟泉 译 朱飞 校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体行动的经济学/(美)康芒斯(Commons, J. R.)著;朱飞,田松青,盛龙飞,常程,孟泉译.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书名原文: 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ISBN 978-7-5045-8123-5

I. 集… II. ①康…②朱…③田…④盛…⑤常…⑥孟… III. 公共选择(经济学)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7478 号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1号 邮政编码:100029)

出版人:张梦欣

*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6.25印张 277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4929211

发行部电话:010-64927085

出版社网址: <http://www.class.com.cn>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4954652

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常 凯

副主任 杨河清 姚先国 崔 勋 王玉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桂兰 王玉君 李丽林 乔 健

朱学敏 朱 飞 张红兵 杨河清

杨伟国 易定红 姚先国 常 凯

崔 勋 黑启明

丛书总序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劳动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关系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能否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学界如何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理论支持，则成为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我国关于劳动关系的学术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主要是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90 年代以后，面对日益突出的劳动关系问题，学界开始有人借鉴和引进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理论和方法，试图对于中国的劳动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其中 90 年代中期出版的以《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当代中国的劳动问题》一书为代表的著作，即是这种尝试的产物。但这种研究还仅仅是中国劳动关系学术研究的艰难的起步，不仅参与人数有限，而且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加之当时劳动关系问题还没有到了急迫的程度，所以这一研究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大的反响。

到 2000 年前后，随着劳动关系问题日益加剧，劳动关系开始成为学界的关注问题。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劳动关系研究不再局限于劳动部门或工会部门，而成为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出版了一批劳动关系译著和著述。这些著述开始更多地介绍和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关系理论和制度，研究的视野开始放宽，研究的内容也开始深入。而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和实施，劳动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都在用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来对于劳动关系问题做出解释。这一期间，出版了大量的劳动关系教材、专著和研究论文。应该说，中国劳动关系研究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时期。

但是，尽管劳动关系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这些著述大多是介绍性或应用性的研究，真正的理论著作和文章很少，而能够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成果更是难得一见。这种情况出现的

原因,除了揭示劳动关系本质规律的理论需要一个过程,还与中国的劳动关系研究缺乏学术基础和学术传承直接有关。与西方的劳动关系研究相比,中国的劳动关系学科刚刚建立,劳动关系研究目前还没有脱出起步的阶段。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研究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或学术领域。这门学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是两部最经典的劳动关系研究著作。在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和工会研究是不可分的。在20世纪之交的时候,韦伯夫妇出版了他们的《工会主义的历史》(A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和《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对英国的工会主义进行科学分析。而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John Commons)在他的192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进一步阐述了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外部社会主义阵营和内部劳资冲突的双重挑战,劳动关系的稳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维持和继续的关键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关系理论在此间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其标志性的著作即是邓洛普(John Dunlop)在1958年出版的《产业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这本被称为战后最为经典的劳动关系著作所提出的劳动关系系统理论,主张运用资本主义自身的机制,在体制之内来处理劳资矛盾,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所制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劳资矛盾,使得一度趋于激化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冲突逐步缓和,从而成功地抵制和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

邓洛普之后,美国学者桑德沃(Sandver)在1987年提出了自己的企业劳动关系分析的理论模型。桑德沃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其出版的《劳动关系:过程与结果》(Labor Relations: Process and Outcomes)一书中。该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和阐述了企业劳动关系的一些具体影响因素以及劳动关系运作中紧张冲突的解决及其后果。桑德沃的理论模型在企业劳动关系研究上至今被人所广泛应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直接影响了产业关系的发展。学界围绕很多国家的产业关系系统是否“转型”展开争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寇肯等人(Kochan, Katz, McKersie)出版了《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一书,系统阐述了其“转型”的观点,并且提出了策略选择理论框架。而英国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在这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海曼(Hyman)所出版的《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

的分析框架》(Industrial Re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一书,则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新时代的劳动关系予以了一种全新的分析。

上述的在西方不同时期的几本比较著名的劳动关系著作,仅仅是西方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基本代表性著作。但是仅就这几本著作而言,已经能为我国的劳动关系研究提供许多理论上的启示和借鉴。遗憾的是,上述这些著作,在中国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外大部分没有中译本。特别是目前在国际劳动关系学界广泛认同的劳动关系系统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的产生恰逢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国内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了解。而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着市场经济国家许多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劳动关系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的解决以及对于中国劳动关系学科的建立,都有着直接的意义。

为此,我们急切需要系统地全面地翻译介绍西方劳动关系的经典著作,以便我们了解、学习、借鉴国外劳动关系的理论成果。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方能推进中国劳动关系研究的理论深度和提高劳动关系研究的学术水平。上述这些著作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从不同的理论层面探析劳动关系问题的特点和规律,主张通过某种路径在体制内调整国家各个层面的劳动关系。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目的是要开阔眼界,是要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以免闭目塞听、囿于井底之见,还以为是创立了人类的新思想呢。一个国家的学科发展,必须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成果,特别是具有国际性特点的市场化下的劳动关系研究,更不可能脱离人类历史的一般经验和价值而另辟蹊径。如果连市场化下劳动关系最一般的特点都不了解,恐怕没有资格来奢谈中国特色。因为所谓的中国特色,只有在国际比较的语境中才有意义。

关于劳动关系经典著作的遴选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要根据劳动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选择每个历史阶段上的代表性著作或者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二是市场反应。作为著作应该是市场上经久不衰的著作,这也是著作本身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价值反映;三是对中国的适应性。这些著作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方法,要对中国劳动关系的研究有所借鉴。

翻译出版“国外劳动关系经典著作译丛”的计划,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推进劳动关系学科建设计划中的一个内容。这个计划最初完全是为了适应劳动关系的教学而提出的。最初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的教师、博士生、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而后这个计划的参与者又扩大到其他高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首批翻译出版的这几部著作,主要

集中于英美国家的学者，今后还将逐步扩大到不同国家和不同语种的劳动关系著作。

我们期望，本套译丛的出版，能够为国内劳动关系专业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学术借鉴，为企业和政府的劳动关系实践者提供高端的理论支撑，为劳动关系的学习者提供经典的辅助读物。总之，为中国劳动关系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专业文献。

常 凯^①

2008年6月20日写于京西时雨园

^① 常凯，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分会副会长。

1970 年版前言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这为评论约翰·康芒斯的理论著作的关键部分提供了便利。在 1950 年出版的本书第一版中，康芒斯对其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 和《制度经济学》(1934) 中详尽阐述的问题做出了简明的解释。这三本书以及康芒斯的自传《我自己》(1934) 原来都是麦克米兰 (Macmillan) 公司出版的，现在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资助进行再版。

这些书籍很容易获得，这为认真研究康芒斯的著作提供了便利。与他同时代的人现在很少在世，甚至他最年轻的学生们也已经在他们各自的职业领域中发展。康芒斯的成就是其成果丰硕的职业生涯的历史证明，但是那些支持其卓越成就、使美国经济平民化和保持稳定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这些思想值得仔细地研究，因为康芒斯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有创造力的思想者。

如同理解所有的理论发明者一样，如果你要理解康芒斯的观点必须从理解他的背景出发。他尝试做什么？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他在晚年期间尝试寻找这样一种经济途径或模式：它可以满足双重需要，将 20 世纪的美国经济系统作为一个人性组织加以分析，同时融入了美国经济思想史上大师们的观点。康芒斯的主要角色是一位探索者，他尝试寻找这样一些线索，经济冲突（例如劳动者与管理方之间的冲突）是怎样创造性地解决的，国家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的力量是怎样建设性地利用的。

由于他在搜寻关于公共政策和产业管理等深刻问题的视角，他的方法变得越来越综合。概括来说，他的思想定位于被称为工具主义或者更为流行的美国实用主义等哲学概念中。

在他看来，集体而不是个人是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单位。他坚持认为，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安全的期望通过集体行动在控制、解放和个人活动的扩张中实现。与把个人当做基本单位的经济理论相对立，他着手设计一种认为所有人类都有自己的意愿的经济途径，没有人是完全无力的。因此，从他职业的开始，他就把权力当做是贯穿生活的基本事实。他关于权力的分析集中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三章“物理、经济和道德权力”一节中。

把权力当做生活的基本方面，并认为在尊重自由的社会里，参与意愿是社会组织的首要原则，然后，康芒斯协调权力和自由的关系。问题是权力是怎样被用来服务于公共目的的呢？他的结论是只有借助优质的公共秩序才可以实现这个过程；而这些程序可以使用权力去平衡权力。这是他关于合理价值观点的基点。只有通过权力的运用并加以合理限制的规则，伟大的公共目标才可以实现。

这种对于程序的强调要求经济分析的假定应足够综合，从而涵盖和表述清楚对经济体的解释，这种解释不只是一种克服自然稀缺性的机制，还应该是工作法则的系统。从而，《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的首开章节被冠名为“机制、稀缺性和工作规则”。

康芒斯把贯穿行动（尤其是集体行动）的工作规则作为经济的一部分加以系统分析。经济学家们把可以使用机械联系加以分析的事物集合当做其基本注意的领域，其对康芒斯的分析感到不解和迷惑。

正如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开首章节评论到的那样，他把自己的观点终生付诸美国集体行动的实验性参与。该书第3页写到：“我见到的任何一个参与了50年实验的人都得出两个结论：利益的冲突和集体行动。”现在的问题不是创造一类不同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从而脱离以前的学派，而是在经济学中给予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一个合适的位置。

康芒斯的系统著作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是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的传统忠实信徒，尤其是洛克（Locke）、斯密（Smith）和穆图（Multhus）的政治经济学，这些都是康芒斯致力于带到现在的，其目的是在一个权力的时代，在一个植根于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系统面对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体制公然挑战的时代，为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早在1909年，在《美国的制鞋工人，1648—1895：产业演变的刻画》（经济学季刊，24，[1909]）一文中，他对产业组织进行了卓著分析，他似乎感到马克思是在20世纪与其齐名的经济学家。

虽然康芒斯扩大经济学领域的尝试理所当然是明智和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经济分析都应尝试这样的通用性（康芒斯的尝试，即使其在康芒斯的时代是有效的，在随后的时代也未必是有效的）。康芒斯不能被理解为传统经济方法的反对者或抗议者。很少有经济学家像康芒斯这样毕恭毕敬地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他所看到的与其他人或许是不同的，这至少是因为康芒斯问的问题是不同的。

康芒斯从经济学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绩效。在这一方面，康芒斯的著作与其同时代的制度经济学家非常相似。这些经济学家大多尝试把经济作为

一个系统进行分析^①。他与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 (Veblen) 及其信徒不同的是, 康芒斯认为选择对经济行为很重要。事实上, 他 50 年来一直努力形成选择经济学的理论——跳出所有拥有个人意愿者的认识。

因而, 在康芒斯看来并不放弃“充分条件”(sufficient reason), 而这是凡勃伦在其著名的文章《边际效用的局限》^② 中所强调的。在这篇文章中, 凡勃伦把“直接原因”(efficient-cause) 的原则当做是科学的经济学的关键。他指出, “充分条件”和“直接原因”的区别“可能是微小的, 这种差别的结果是重要的。两种方法的推理(从充分条件和直接原因)毫不相干, 两种推导之间没有转换: 没有办法把一种推导的程序和结果转化成另一种。”

提及凡勃伦的目的不在于做比较。凡勃伦和康芒斯都是社会思想杰出的先驱。但是只有通过探究其思想基础, 才能理解和洞悉每个人的著作。然而, 康芒斯的著作受到了轻视, 原因在于作为反对者的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们表面上形成了联盟。

事实上, 问题在于这些经济学的创新者们的观点怎样才能与经济学理论的主体整合在一起。我认为在整合问题上, 康芒斯的模式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因为康芒斯尊重选择与决策的创新角色。在这个方面, 康芒斯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在他及其之后的时期中, 他与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尝试: (a) 形成一套非常易于理解的理论, 以便在分析中囊括被数据机械分析的经济社会框架。(b) 在认可理念是排序和重建人类事务的创造性互动的哲学方法中展开工作。正如经济学家惊叹于人类组织和哲学分析的巨大问题一样, 他们一定会发现康芒斯的著作是思想的宝藏。

康芒斯虽然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度过了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 但也一直是一名参与性很强的探索者。在这个方面, 他对来自美国经济和城市化及工业化社会的一系列挑战进行了回应。这种考虑, 连同他与罗伯特·M. 拉·福利特 (Robert M. La Follette) 改革运动的联系, 足以解释他对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的特殊重视。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四个十年是波动不平的。城市重建、恐慌和经济大萧条接踵而至; 州内铁路系统竣工; 北方实现工业化; 大批移民涌入自由的土地和崛起中的工业化城市, 这些人住在贫民窟中且没有有效的居民身份; 在农场主中兴起的反垄断“格兰杰 (Granger)”运动孕育了对铁路收费的规制; 19 世纪 90 年代, 稳定的工会最终出现。出生于 1862 年的康芒斯无畏地分享着这

① Allan Gruchy. 约翰·康芒斯的 20 世纪的经济概念. 政治经济学杂志. 1940, 6: 48

② 政治经济学杂志, 17, 第 9 期, 1909

些经历，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研究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20 世纪早期，康芒斯预见到美国经济系统重建、稳定化和人性化的可能性。后来康芒斯是一个激进者，在社会创造或制度革新方面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康芒斯生活的这个侧面吸引了众多评论，特别是在他的观点和思想，以及为美国社会保障系统打下了坚实基础的威斯康星试验等方面。事实上，康芒斯在解决其所处时代的主要问题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功，使他和他的学生进入了众多机构的管理中，这些机构都诞生于他丰富思想产生出的启迪之下。

他的独创性，尤其是他深刻的见解受到他同时代的人和他的学生的欣赏和敬佩。然而，康芒斯却主要是由于其对公共政策和行政的影响而闻名并且受到尊重。因而，康芒斯作品更宝贵的部分，即他敏锐的分析和哲学思想，很少被理解。或许康芒斯的学者本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没有信奉者把他的著作传承下来，因为他所尝试的东西非常复杂和困难，以至于他的学生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

理解康芒斯的关键之一是他是世纪转折点产生的少数杰出学者之一。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自信和充满希望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约 20 年的时间里，至少有些年轻的学者可以在堪称纯粹的研究中心的大学中找到老师，在其门下学习，因而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些老师大多熟识系统的欧洲思想以及生机勃勃的美国。在那里，普通人作为自尊的公民，为改革而欢呼雀跃。美国梦因恐慌、垄断的铁路、各产业危险的工作条件以及城市贫民窟中难以言表的污秽而受挫。然而，在这样的苦果之下存在着一种具有活力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成功地占领一个大陆和建立了一个赢得全世界尊重的产业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为无数的贫穷移民提供了经济机遇。

这些实践诞生于一种以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著称的哲学运动。康芒斯是这些有创造性的成员之一。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其大量的著作中找到一种简捷的分析哲学的整合表述。因为康芒斯是一名经济学家，研究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用内尔·张伯伦（Neil Chamberlain）的话来说，康芒斯最棒的毫无疑问是他的“赤裸裸的观点”。康芒斯对其时代的主要议题有诗人般的敏感，或许没有人可以把一连串机制的观点的含义整合成一套综合的系统的陈述而不失去新颖观点的品质。

康芒斯从查尔斯·S. 皮尔士的著作中获得最深刻的哲学灵感。他的工作与生活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相类似的，但是在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即便如此，人们也可以通过研究杜威的著作《人性与行为》《公众及其问题》和《稳定性的追求》，尤其是《逻辑，探索的理论》学习到许多康芒斯基本思想的含义。

康芒斯对人类实践以及从其中可以学习到的教训保持高度的敬畏之心。他是一名大师级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的更深层含义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中著名的历史篇章有所展现。在这些文章中，他提炼出封建主义和行会的实践，以及财富、主权、谈判权、自由和机遇的基本含义和客观含义。他对实践的尊重也体现在他对合理性而不是纯粹证据的重视上。康芒斯坚信人类具有重建世界的能力。这就是说，他认识到，思想和意识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有创造性的互动。

从这些哲学前提出发，他没有像哲学学者们那样过多地探讨含义、稳定性和系统构建，而是研究产业化和产业规制、政策和行政，试图将经济系统人性化、稳定化。

尽管康芒斯很少用这个术语，但他的思考确实是问题导向型的。他对问题解决方案的表达专注于限制性因素和策略性因素。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原因的概念是公认的，在数不尽的关联和依赖中，原因被归结为产生控制的因素，让人们给出事件的方向。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体系，一套起重要作用的方法和思想集合。如果人可以看做是有意志力的，那么通过实现高贵的地位就能够上升到成就的新高度。康芒斯的分析集中于程序，凭借这一程序，损害性的冲突可以被充分调和，以实现秩序的多方优势——这可以浓缩在“参与意愿”和“安全预期”这两个词中。

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主流经济分析发生了变化。国家和经济制度被当做既定的框架。集体行动的研究、财产权的性质和权力的结构没有包含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虽然康芒斯着力研究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问题，但是当代经济学认为价值系统是既定的，被当做是偏好的系统或者无程度差异的事物；虽然康芒斯努力理解个人是怎样行动的，甚至个性是怎样通过多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形成的，但是当代经济学分析假定既定的个人，甚至把社会当做个体的加总。

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康芒斯的观点是超前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或者不对。这不是事实。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工作，康芒斯处于一种可控的哲学意识中，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康芒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致力于扩大经济学的领域，拓宽经济学的概念。正如曾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在《制度经济学：观察制度主义的新视角》评论中提及的：“我认为康芒斯尝试扩大经济抽象的边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从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不如扩大经济学原有的概念那么多。他关于交易的思想是从交换的概念推广而来的；他关于‘运行的组织’（going concern）是从企业的概念推广而来的；他关于‘工作规则’的概念是从经济行为的提法推广而来的。这些概念都没有更多的从其他社会科学中

汲取营养；尽管康芒斯似乎总是不能把他的哲学框架构建成一套有规则的体系，但他还是在组织和行为理论中预见到很多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①

在此评论中，我尝试指出一些问题或想法，可以为解释康芒斯的大量著作提供启示。这是一项研究，旨在探究打开理解康芒斯思想的新视野的路径，从而促进了系统评论康芒斯著作的团体的成长。尽管这样的提升仅来自于学术或相似的知识环境，我们可以决定的是，人类面对的更大的问题将为研读康芒斯的著作提供舞台。如果世界进入了巨大的制度重建时代，在欠发达地区创建政治经济新的运行系统成为必然，革命地区为获得经济机会而引发冲突，那么学术团体将转向康芒斯的著作，探寻关于英美经济是如何从封建主义、行会体制和巨大的贫困演变而来的原理的观点和含义。同样，在美国正在出现的所谓后工业社会中，学术团体更有可能发现康芒斯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很有启发性。

很明显，康芒斯希望自己在最后的这本书中创立一个概括性的系统。至少，康芒斯尝试创建一套比以往在经济学家中流行的和正在流行着的理论更有包容性的经济理论。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看来（《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六章），康芒斯试图从来自于李嘉图的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模式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并解放自己。库恩说，在既定的科学模式中的研究基本是迷惑解决型的，而不是问题解决型的。如果康芒斯的著作在为将来的经济学家提供一个更有创造性的模式方面有所贡献，那么他的著作就不是徒劳的。

KENNETH H. PARSONS

威斯康星大学

University of Ife, Ile-Ife, 尼日利亚

1969 年 6 月

① 美国经济学会第 69 次会议论文集。美国经济评论，47，第 2 期 [1957]

编者序

康芒斯教授在 1934 年发表了《制度经济学》及其自传《我自己》之后，本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退出了教坛，时年 72 岁，他当时身体衰弱，健康状况堪忧。当时，我们看到康芒斯教授的时候，甚至怀疑他能够亲眼看到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但是，在这两部著作出版之后，他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他卖掉了他的著作，购买了一辆拖车式活动工作室（trailer），和他的侄女一起去了佛罗里达。当地有益健康的气候和朋友们的温暖友情，使康芒斯教授很快得到了恢复，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于是，他在学生们的鼓励，计划用简单的话来说明其复杂的思想观点，他整整坚持工作了 10 年。

如果他能够见到本书的出版，我相信他会感谢对本书出版有所贡献的数十个人。我在他晚年期间和他一起工作，作为本书的编辑之一，我只能不胜贴切地进行道谢。

他很感谢 Theresa S. McMahon 夫人的帮助。在他用自己的说法得到“我已经彻底结束了”的结论的时候，McMahon 夫人曾经建议并且勉励他撰写本书。

他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助手塞利格·珀尔曼教授，从麦迪逊时代起就与他一起工作，他校对原稿，监督打字，而且，年复一年地保持著述的顺畅。在珀尔曼教授的书斋中可以看到康芒斯教授的完整文卷。

莱昂娜·斯皮尔曼夫人在 1936 年和 1937 年的若干个月中曾经在 Madison 和他一起工作。后来，她提交了她的博士论文，比较康芒斯和凡勃伦的观点。

1941 年，他的侄女 Bertha Best 去世了，康芒斯教授又重新陷入孤独。后来，Chester Meske 成了他的伙伴，同时也是他的助手。Meske 是当时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生，直到 1942 年 7 月都与康芒斯教授一起工作。他们两人将全部原稿大大缩短，又用各种方法使其叙述更加明确。

1941 年到 1942 年冬，芝加哥的联邦牛乳市场管理官事务所 H. H. Erdmann 来到佛罗里达访问康芒斯教授。第十章中“相似点与不同点”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谈话记录。有一个名叫 Erdmann 的学生向其他少数学生

一样，曾经赞扬康芒斯这一部分方法论的重要性。Erdmann 看到这种观念在行政工作上极有价值，他曾经鼓励他的老师进一步说明这一部分的想法。这部分是康芒斯在各种差异点之中寻求显著相似点的方法的一种尝试。

农业部法务代行专务局的 Philip Glick 曾经在 Henry Wallace 长官和 M. L. Wilson 的友好许可之下，在 1941 年来到佛罗里达，帮助康芒斯调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原来农业调整法案失效一事。他的分析曾经在 1942 年 5 月发表在《农业经济学期刊》上，题为《经济学中的立法和行政的理论》，在本书中，作为第 16 章劳资的一部分。

对于康芒斯的那些在拖车式活动工作室中认识的朋友，康芒斯教授的学生们和朋友们都特别感谢。1942 年，A. B. Carpenter 夫妇在他们的家里招待了康芒斯教授。因为当时康芒斯教授已经年近 80 岁，拖车式活动工作室中的环境不宜老人度过寒冬，Carpenter 家里温暖的炉火和 Carpenter 夫人的热情招待使康芒斯教授的晚年充满了愉快和温情。1945 年春，他离开 Carpenter 家，和他的儿子一起去了北卡罗来纳，和一个尚在人世的妹妹一起共度晚年。

1943 年 11 月，康芒斯教授来信问我，能否挤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和他一起工作。他的精力有所下降，并表示如果我不帮助他，他担心这本书可能无法完成。我在某一时期开始注意过康芒斯的理论，这开始于 1929 年，当时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学院研究，听过他“公共价值”的课。我对他的观点印象深刻，康芒斯的意图甚至让支持他的读者都觉得很难理解。这让康芒斯教授非常困扰。我在经过大概 10 年的读书和思考之后，于 1942 年写了一篇文章，意在说明康芒斯教授观点的根本原理，并且试图表明社会思想对于更大问题的联系。康芒斯教授对这篇论文大为赞赏^①，邀请我以这篇论文作为本书的序言。后来，我们决定由我写一篇序言，以便更为直接地表述本书的内容及其重要性。我对于康芒斯教授的见解的论文包括在本书的附录之中。

1944 年 6 月，我得到威斯康星大学大学院研究委员会的资助旅行，使我能够去佛罗里达。我和康芒斯教授一起工作了 5 个星期，共同整理了其全部的书稿。

在共同研究的工作期间，我们每天都花两个小时讨论原稿。然后，我们就我们达成一致的地方进行改编，修整文字。第二天，康芒斯教授对已经订正的原稿再进行推进。“价值：经济学家的价值论”一章就是这样在 1944 年春天最终

^① “John R. Commons’ Point of View”,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August 1942.

定稿的。与其他章节相比，这章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康芒斯关于物理学家的理论的最近研究观点反映在这一章中。事实上，他在此已经放弃了他对价值的因素关系概念，他的思考更加集中在实践判断工作性上。我对本章的订正任务只是编辑性的。这是因为，我只为明确康芒斯教授的意思，而撰写了几个起承转合的段落而已。全书的撰写过程都是如此，我的目的和工作是用我的手代替一双已经虚弱的手，使那颗精力充沛而且富有创造力的心可以得到充分的表现。

我回到麦迪逊以后，检查了参考文献部分（包括已经被引用的裁决案件等），在原稿的若干处进行了小幅改动，并且重新录入。原稿于1945年春送还给康芒斯教授，他又对全部书稿进行了检查，并附了一些修改意见，在1945年4月送还给我。他认为比较满意了，并且已经没有修正的必要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

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度过了快乐的几天，他到Chapel Hill的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Frank Greham教授和Howard Odum教授，他还访问了附近Duke大学的Bruce Hoover教授。他在这几天一接触到大学的空气，就有返老还童之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慢步小跑。1945年5月，他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利去世，当时他的儿子和妹妹在身边。

最近，我将全部的原稿重新浏览了一遍，对一些地方进行了订正，以期让文字叙述更加明了。在这项工作中，大学院农业经济学系的学生们阅读了全部原稿，特别是John Bowditch和Erven Long的评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Erven Long，他和我对本书的许多晦涩之处进行了讨论。埃德温·E. 威特（Edwin E. Witte）教授曾经是康芒斯的同事，也是他长期的学生，他曾经阅读原稿，并且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建议。为了叙述得更加清楚，我采用所有这些建议。在有些地方，原稿仍然不够完整，有些附注也仍然不够清楚，这些只有康芒斯教授才能够清楚了。

我准备原稿的出版时，必须在政策的问题上有所决定。关于这些问题，我曾经特别请教了4位同事，他们是我原来在大学院读书时的老师，也是康芒斯教授的学生，他们是塞利格·珀尔曼（Perlman）、马丁·格莱泽（Glaeser）、埃德温·E. 威特（Witte）和MacNall教授。MacNall教授曾经给我阐述了康芒斯教授方法的独特性和独创性。我对他们的建议、勉励和支持深表感谢。

本书不仅是长期著述生活的最后成果，它是那种对人类贡献永不动摇的研究精神的丰碑。